



兰州大学 文库

A LIBRA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
屈直敏 赵梅春 主编

四库研究丛书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研究

郭合芹 著

四库研究
丛书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兰州大学 文库

A LIBRA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
屈直敏 赵梅春 主编

四库研究丛书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研究

郭合芹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研究 / 郭合芹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5. 12
(四库研究丛书)
ISBN 978-7-311-04387-2

I. ①四… II. ①郭… III. ①《四库全书总目》—研
究 IV. ①Z8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1517号

策划编辑 王永强
责任编辑 李 丽
封面设计 郇 海

书 名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研究
作 者 郭合芹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甘肃兴方正彩色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32千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387-2
定 价 38.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前 言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丛书，汇集了清代乾隆以前的主要文化典籍，堪称“千古巨制，文化渊藪”，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该丛书共收录书籍 3 461 种，79 309 卷；存目书籍 6 793 种，93 551 卷。^①《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为了利于长期保存，供皇帝和士子们阅读，共抄写七部，分别度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承德文津阁、沈阳文溯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后因战乱，遭到毁损，其中文源阁本毁于 1860 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文宗阁、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文澜阁本于 1861 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散损。历经劫难的《四库全书》，现仅存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以及半部文澜阁本，文津阁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本现藏甘肃省图书馆九州台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产生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考证》《禁毁书目》等相关典籍，并派生出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摘藻堂四库全书》《四库存目》《四库未收》《四库禁毁》《续修四库全书》等多种丛书，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四库全书》自问世以来，便以它独有的魅力，备受学界关注。近 200 年来的《四库全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大致可分为乾嘉至光宣年间、民国年间、1949 年至今三个阶段^②，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纂修与流传、档案辑录与整理、《总目》研究、版本目录研究、文化价值及意义的研究、续修与影印及电子版

^①《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中华书局 1965 年。

^②周积明：《“四库学”：历史与思考》，载《清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50 - 62 页。

开发等诸多方面。^① 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先后成立了一系列关于《四库全书》研究的学术机构,如 1993 年成立的“海南大学《四库全书》研究中心”,1999 年天津图书馆成立的“四库文献中心”,2003 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的“《四库全书》学术研究中心”,2005 年成立的“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和武汉大学“四库学研究所”等^②,为《四库全书》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随着《四库全书》研究的兴盛,《四库全书》研究上升到了建立学科的高度,“四库学”“四库总目学”“四库全书学”“四库区域文化学”逐渐被提出。

近 200 年来,虽然《四库全书》研究的成就显著,但仍有诸多领域,学者们鲜有涉及,如四库学的文化研究仍然是四库学中最薄弱的部分,因而如何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去审视《四库全书》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学界应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四库学的研究范围、纂修者的个体和群体、四库收录之区域文献等也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因此在继续深入实证和文献研究的同时,转换学术观念,加强理论建设,扩大视野,对《四库全书》及其相关和派生的多种丛书、论著等进行整体和全面研究,借此展开四库学的研究新局面,无疑是当前四库学研究者值得思索的课题。

兰州大学史学史专业是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1978 年全国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史学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张孟伦先生被批准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从此开始了兰州大学史学史的研究事业。2005 年经学校批准,建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汪受宽先生任所长。2008 年汪受宽先生荣退之后,赵梅春教授继任所长。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素以师资雄厚、学风严谨著称,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四库学等。经过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不仅在学科建设和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而且培养了大批学术成就卓著的史学研究者。

近十年来,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以《文溯阁四库全书》为中心,确立了以四库学的研究为主要方向,积累了丰富深厚的成果,建立起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此次出版的《四库研究丛书》是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

^①汪受宽、刘凤强:《〈四库全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史学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62-66 页。

^②高远、汪受宽:《近三十年来〈四库全书〉研究现状与思考》,载《图书与情报》2008 年第 3 期,第 119-125 页。

史研究所四库学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汇集,共收录了汪受宽和安学勇《文溯阁〈四库全书〉四种校释研究》、刘凤强《四库全书馆发微》、郭合芹《〈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研究》、徐亮《〈四库全书〉西北文献研究》四部专著,在《四库全书》的编纂、《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版本价值、《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清修《四库全书》与西北地方文献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本套丛书的出版,必将使学界更加深入了解《四库全书》,尤其是《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学术价值和文献版本价值,从而促进四库学的研究,推动《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整理研究热潮,促进甘肃省的四库学研究。在当前文化大发展的形式下,对甘肃省的文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四库全书》同长城、京杭大运河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深入《四库全书》的研究和利用,可以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屈直敏

2014年12月4日于兰州大学二分部陋室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之类例观	(4)
第一节 《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	(4)
第二节 《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15)
第三节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之分类原则、特点	(20)
第二章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35)
第一节 以大小序、提要揭示史学之流别	(36)
第二节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	(68)
第三章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之旨趣	(73)
第一节 维护封建正统观	(73)
第二节 以史为鉴,以达史学“资治”之作用	(85)
第四章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与史学批评	(89)
第一节 博采善择	(89)
第二节 史实与褒贬	(105)
第三节 论世知人	(115)
第四节 提要内容与史学批评	(121)
结 语	(190)
参考文献	(192)
后 记	(196)

导 论

一、选题起缘

本书的选题,除了源于《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在指导阅读古典文献上的重要作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其融汇了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政治、社会思潮等内容。窥一斑而知全豹,它是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载体。

《总目》对阅读古典文献有指示门径的重要作用。书籍诞生之后,日益发展以至于浩如烟海不可胜数。面对如此浩渺的典籍,目录学的重要作用便显现出来了。史家的目录著作不仅是书籍海洋里的指南针,而且撮举书籍大意,为我们“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提供便利。正如毋熨在《古今书序录》中所言:“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愈其已!”^①可见没有目录书做指导,在浩瀚的书海里以有限的生命对无限的典籍,真可谓是“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只有假借于目录著作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使我们尽可能地窥视群书之大旨。并且我们通过撮举书籍大意的目录书可以很快排除不需要的书籍,便利了读者,节省了时间。

《总目》代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高峰,也充分体现出了古代的学术思想。《总目》是我们阅读古籍的重要窗口,是保存至今卷帙最大的古典目录书,仅史部就著录了两千一百余部典籍。其史部立足于前人研究成果,在分类,序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要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代表了古典目录学

^①《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5页。

的最高水平。作为目录书,《总目》史部首要的作用应是指导阅读古籍,除了据此来检阅《四库全书》,仅翻阅史部提要就可以获取书籍之大旨,而且也可以获知清代学者在“知人论世”等方面的看法;《总目》采用四部分类法,将四分法推向目录学的最高峰,而且通过图书分类,可以获知分类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整个史部有大小序,从宏观和整体上论述学术发展脉络。正如晚清张之洞所言,“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体现了史部在指导阅读古籍、了解学术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基于此,对《总目》史部从分类、大小序、提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于治史学史者尤其必要。

二、研究现状

《总目》自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关注,“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为过当”^①。近现代关于《总目》史部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时段进行论述。

1. 20世纪前半期。出现了众多研究《总目》的学者,如孙德谦、陈垣、余嘉锡、胡玉缙、刘国钧、夏承焘、钱穆、金毓黻、王重民、杨家骆、陈乐素、郭伯恭、黄云眉等。他们发表了众多的论文、专著,对《总目》进行考辨,或对某些问题发表见解。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主要对史、子、集三部的提要进行了辨证,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等,都是对《总目》进行纠谬的力作,促进了对《总目》史部的研究。

2. 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四库学”研究的高潮。此时期,研究史部的论文较多。有对《总目》史部价值的评估,比如胡昌斗的《评〈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学史上的贡献和影响》(《图书馆论丛》,1996年第3期)、王晖的《〈四库全书总目·千顷堂书目提要〉评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增刊)。有对《总目》史部的编纂、分类、目录版本的研究,比如周彦文的《〈四库全书总目〉目录类论述》(《书目季刊》,台湾,1999年第1期)、周汝英《〈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述评》(《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等。还有对提要的研究,比如周生春的《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提要辨证》(《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有对《总目》学术思想的研究与批评,比如张新民的《通观与局部——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方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周积明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和《〈四库全书

^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48页。

总目》的史学观》(《江汉论坛》,1991年第7期)等等。据周积明统计,从1915—1992年间仅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大约在110篇^①。台湾地区研究《总目》的主要有:昌彼得、乔衍琯、严耕望、杨家骆、吴哲夫、王汎森、杨晋龙等学者。他们还指导了一批学位论文,比如许文渊的《清修四库全书之目录学》等,进一步促进了“四库学”的研究。

3. 进入21世纪,“四库学”的研究更趋炙热。司马朝军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专著《〈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从多个角度论述了《总目》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包括史部的分类和提要等内容。在大陆的一些高校里也出现了以《总目》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对《总目》史部的研究。

研究现状之分析:从上面有关研究情况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从《总目》史部诞生直至今日,有关它的研究一直未曾中断,对史部纠谬方面的成果颇丰;对分类、编撰、学术批评方法等方面也有研究,但缺乏全面详细的研究。比如有关史部分类方面的论文大都是零星、片面的,并且很少涉及分类的内在原因;对《总目》史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容,尤其是对一家之学术研究较少;对《总目》史部所暗含的“史意”少有论述;另外,就《总目》史部提要来研究学术批评的内容也不全面。这些都说明有必要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总目》史部。

三、本书的思考

本书立足前人研究成果,基于《总目》史部在帮助了解、阅读古籍上的重要作用,着重对《总目》史部的分类、序言、“史意”、提要等方面进行论述和分析。本书力图通过《总目》史部之分类与《隋书·经籍志》史部之分类的比较,阐述《总目》史部的分类原则和特点,以及类例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并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分析《总目》史部的分类思想;以及论述《总目》史部所暗含的“史意”;最后从博采善择、史实与褒贬、知人论世等方面,对史部提要进行史学批评。由于笔者学识和研究能力有限,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运用不够充分,在第四章进行史学批评时,不够全面、深刻。敬祈方家批评。

^①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第一章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之类例观

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在前人努力和成就的基础上,清代目录学作为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者,如百川汇到东海一样,汇集以往前代目录学成绩及克服前代所存在的不足,取得了传统目录学的最高成绩。清乾隆时期纂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目录——《四库全书总目》便是明证。

而在介绍《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之前,需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

第一节 《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

本书所要研究的史部隶属于《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总目》隶属于《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的解题目录。这就是说三者具有层层隶属的内在逻辑关系。要讲《总目》史部之前,有必要将《四库全书》及其《总目》介绍一下。

一、《四库全书》全貌

《四库全书》编修于清乾隆帝时期,收入三千四百六十一一种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艺术、文学、建筑、农业、天文、历法、宗教、医学、西学等等传统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大型丛书。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而衍生的有《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姑且不论《四库全书》整理过程中潜藏的复杂动机以及出现的多元社会效果,单就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规模来说是巨大的。就此杨家骆将《四库全书》与法国18世纪的《狄德罗词典》并论,称其为“清算当时所认知的知识世界的一切,成为东西辉映的两大文化工程”,两者堪称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他在《四库全书学典》中说:“在中国,一说到《四库全书》这个名词时,无异说百科具备而有条理的书库。换句话说,就

是以丛书体裁表示出的当时中国人的知识世界。”这就是说我们认识《四库全书》极具必要。

1.《四库全书》编纂缘起

《四库全书》得以编纂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首先,我们来考虑《四库全书》得以编纂的社会背景。1644年,清朝入关,定鼎中原。如同历代皇朝更替、发展的规律一样,经过前期几朝皇帝的“励精图治”,清初百废待兴的局面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代明而立的合法性已经普遍得到认同,出现了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的难得局面。虽说在乱世也有官修典籍的历史存在,但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确实为大规模的国家修书提供了极具保障的社会大背景。

第二,政府修书的历史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这个悠久历史得以传承下来的原因之一就是编纂历史。据记载,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记载历史的典籍,比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此后,周天子和诸侯各国都设有史官,记载君主言行和朝中大事。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①诸子百家纷纷兴起,他们著书立说,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出现了第一个繁荣局面,留下了对后世至为宝贵的大量典籍。

秦“二世而亡”,其短命而亡被认为主要是统治者统治残暴的结果。统治残暴的最典型表现就是野蛮地对待文化的载体典籍和知识分子:焚书坑儒。秦政府的此种行为从侧面说明了典籍以及纂写典籍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中的巨大作用。封建政府对待这种巨大的作用不外乎使用了两种手段,不是赶尽杀绝使其彻底就范,就是竭力拉拢以为己用。

汉皇朝建立以后,直接从秦“二世而亡”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实现与民休息的政治。而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对文化典籍和知识分子开放绿灯,就是注重文治,《汉书·艺文志总序》记载汉代皇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隋书·经籍志·总序》记载惠帝“除挟书之令”,《汉书·艺文志·总序》记载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成帝“求遗书于天下”,并命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皇家藏书,诞生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七略》。此后,国家藏书,以及征集、收藏和校理图书的这一套做法,为历代王朝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为编修大型图书的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说政治并不稳定,但各统治者仍能榜示文治,并在此时期出现了图书四部分类法的雏形。魏秘书郎郑默奉令整理秘阁藏书,编成《中

^①《左传·昭公十七年》。

经》，晋荀勖因之而作《新簿》，同时改以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群书，创立了中国古代四部图书分类法。东晋时期李充调整四部类目，并厘定经史子集为四部的排列次序。

《宋史·艺文志》称历代典籍“莫富于隋唐”，这些都与政府广开献书之路的策略是互为因果的。《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文帝诏令“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唐时期更是出现大批典籍，“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①

北宋在重视典籍方面尤为突出，其历代皇帝无不诏令访求天下遗书。出现了《崇文总目》《秘书总目》《儒学警悟》《百川学海》《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等大型书籍。此外，在宋代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雕版印刷技术普及民间，私人校书、刻书、藏书风气甚盛，这也对后世的聚书编书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朝，不管它在其他政策上如何，在对待文化典籍上与历代政权是一脉相承的，进行了求书、藏书和编书的活动，如纂修宋、辽、金三史。

明朝建国之初即重视典籍，据《明史·太祖本纪二》记载，朱元璋攻下北京之时，即“封府库图籍”。《明史·艺文志》记载成祖访求遗书时“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编纂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采集图书达七八千种以上。明朝时编纂的《文渊阁书目》，收书四万三千二百余册。

清朝入关，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尽快取得代明而获得合法性的普遍认同，除了使用暴力手段之外，更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拉拢。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很长时间对汉族是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态度，由此而产生的对汉族政策就是提防，其二就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拉拢，使其同化为自己的族类。

在意识形态拉拢上的表现之一就是编纂典籍。顺治四年（1647年），江南尚处于战火纷飞之中，便下令纂修《明史》。此后，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及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都曾下诏，令各省督抚学政购求遗书。值得一提的是历经康熙两朝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十九部，一万卷，总结了以往类书编纂的成就。这些都为乾隆年间更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活动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纂修典籍在帝王政治中具有巨大的作用。一在有着编纂典籍传统的社会

^①《宋史》卷202《艺文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5032页。

里,纂修典籍能够体现出至高无上帝王的煌煌文治业绩;二正如我们在前面论及的秦代焚书坑儒的终极目的一样,帝王编纂图书除了稳定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释放自身的能量,体现自身的价值,有归属感之外,还有就是通过编纂图书来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梳理和教化。这些都应是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原动力。

2.《永乐大典》的辑校刊布和《四库全书》的开馆

古代中国无论私人还是官方都有藏书和纂修图书的习惯,因此古代中国图书汗牛充栋,但图书毁损的现象也很严重。隋代牛弘曾将自秦至隋图书毁损的现象归结于“五厄”。面对这种情况,搜辑亡佚书籍便成为学者关注和重视的工作。在清代,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的《永乐大典》自然便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

《永乐大典》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全书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据《永乐大典凡例》所云,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庾词逸事”。所收古今图书达七八千种,且价值很高,其中有不少是元代以前的珍本秘籍。

清代学者屡次奏请辑校刊布《永乐大典》,但都未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乾隆帝如历代帝王一样下诏访求书籍,安徽学政朱筠借此重提辑校刊布《永乐大典》之事,称:“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觐者,辄具在焉。”“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①朱筠的提法与乾隆访求书籍的意图如出一辙,经过军机大臣讨论,决定派遣人员对库中《永乐大典》,“逐一详查,其中如有现在实无传本,而各门凑合尚可集成全书者,通行摘出书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伏请训示遵行”^②。乾隆帝当即下谕施行。

《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对《四库全书》的开馆主要起到了抛砖引玉积累经验的作用。由于对《永乐大典》的辑佚进而拟定了关于访求书籍的措施。第一,关于搜访旧本钞本,遵照原奉谕旨办理即可,“不必另定章程”。第二,金石图谱“应如该学政所奏,令各该省于收书之外,凡有绘写制度、名物如聂崇义《三礼图》之类,均系图谱专家,宜并为采辑;其有将古今金石源流叙成书如欧阳修、赵明诚所著者,亦宜一体汇采”。第三,关于著录校讎,当佚书籍汇齐时,“敕令廷臣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

^①《笥河文集·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卷1。收入《办理四库全书档案》。

^②《大学士刘统勋等奏议覆朱筠所陈采访遗书意见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53页。

撰人姓名,垂示永久”。^①

乾隆帝认为作为类书的《永乐大典》在体例上存有不足:“原编体例系分韵类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难期贯串。”^②欣赏四部分类法,“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哀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③。确定以不割裂书籍的丛书形式编辑四库全书,要求将《永乐大典》“择其醇备者付梓流传,余亦录存汇辑,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胜轨”^④,《四库全书》开馆。

3. 规模空前的征书活动

进行规模空前的图书整理的前提是要有不可胜数的图书,因此规模空前的征书活动便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首要任务。征书活动开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迄于四十三年(1778年),其中以三十八、三十九年间为最高潮。各地征收来的书籍成为《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它们占据了全部著录和存目书籍的绝大多数。各地征收来的书籍被分为“各省采进本”和“私人进献本”,加以“内府藏本”和从《永乐大典》辑佚出来的“永乐大典本”等,构成了《四库全书》的全部来源。

清政府动用政府的力量,采用了恩威兼施的手段,迫使地方政府、私人藏书之家纷纷献书。几年时间里征集图书总数达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内二百七十二种重本),其中包括不少举世罕见的珍本秘籍,保证了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的开馆,而且也为《四库全书》的编纂质量也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4. 专制皇权的伴生物——禁书

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专制皇权便成为封建社会里说一不二的权力中心,各种事物均跪拜于专制皇权的石榴裙下,包括史学。专制皇权对史学施展淫威的表现形式便是文字狱和禁书等。乾隆之前清朝皇帝已兴起多次文字狱,以庄廷琬案为著。同样作为专制皇权代表者的乾隆帝对历史典籍的蹂躏与历代帝王的做法相比在程度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乾隆朝征访书籍之初,尽管皇帝三令五申,但各地督抚并未闻风而动。而敢于对皇帝的三令五申拖拉推诿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害怕文字狱,害怕由文字而祸乱自身。深谙儒家思想精髓的乾隆帝便考虑到文纲之密,已使人

①《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大学士刘统勋奏折。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谕。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

④《谕内閣传令各督抚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们如惊弓之鸟,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改变局面,乾隆信誓旦旦地说:“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防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在乾隆帝的软硬兼施下各省遗籍纷纷献出。在数以万计的访书中,难免会出现“违碍悖逆”的文字。对此乾隆帝高度重视,运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开始了比征书时间更长的禁书活动。

禁书活动开始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方告结束。只要“字义触碍”“抵触本朝”“荒诞不经”“语涉抵触”,应行销毁,此外对一些典籍也进行了抽毁、改动。并且禁书范围几乎扩展到了有文字所能记载的各种形式上。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地位,把各种书籍中出现的异己思想作为假想敌,进行消灭,这种禁书活动,给古代中国的文化思想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一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宋元以后的文化典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死浩劫;二是遏制了人心,打击了知识分子,造成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①的可悲局面。

5.《四库全书》的成书

全国范围大规模的访求书籍,伴随禁书,即是对《四库全书》所著录书籍的选择,以及成立组织完备、机构庞大的四库馆。在乾隆帝的指导和控制下,第一部《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告竣。

在全书编纂过程中持续时间最长、耗费人力物力最多的是《四库全书》的缮录与校订。乾隆决定对全书进行缮录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全书所著录图书种数和数量庞大,无法全部刊刻;所收图书版本不一,大小长短各异,不便陈设;全书的编纂过程亦即篡改图书的过程,而缮录抄写最易更改图书内容;各省采进本以及私人进献本相当一部分属于借用性质,乾隆征书之初就信誓旦旦保证书归原主。因此乾隆下令对经过厘定合格予以著录的书籍,全部采用抄本。

校订是《四库全书》编纂最后的关键部分。《四库全书》所要著录的图书经过缮录,也就是照本抄写之后,最终决定其质量的就应该是校订,就是消灭讹误。乾隆对编纂全书出现的讹误予以批示:“妥立章程,俾各尽心校录无讹。”^②在乾隆的谕令下四库馆订立章程,并付出相当的人力财力对全书进行了艰巨的校订工作。

^①《龚自珍全集》第9辑,《乙酉·咏史》

^②《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九日谕。

经过缮录和校订,内廷四阁全书次第告成。第一分《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首先告成。这从当时在四库馆自备资斧充任供事的陈逵的奏折中也可得到证明:“前于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在四库馆自备资斧充当供事,至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第一分全书告竣。”^①乾隆因“第二分《四库全书》校缮完竣,办理尚属迅速”,特谕将总校王燕绪、朱钤,收掌吴树萱、柴模等人予以议叙授职。^②此时正值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三分全书于乾隆四十八年冬告成。第四分全书于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缮竣。五十年正月,总裁永瑆奏请:“臣等办理《四库全书》第二、三、四分,督率提调、总校、分校、收掌、誊录人等,上紧赶办,每年呈览一分,今第四分全书,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缮校全竣,恭折奏闻。”^③由此可以证明第四分全书成书时间。从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内廷四阁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次第成书。

乾隆在办理内廷四阁之际,便考虑到广布文泽,而人文渊藪的江浙便是最好的地方,因而在办理二、三、四分《四库全书》的同时,四库馆便开始了江浙三阁全书的续缮和校订工作。并于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续办三分全书同时告竣。

6.《四库全书》的历史命运

内廷四阁以及江浙三阁全书成书以及送藏之后,七阁全书和历代典籍命运一样是多舛的。1840年以后古老的中国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更给中国的典籍带来了灾难。第一分文渊阁《四库全书》地处宫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为防不测,于1933年将藏书全部运往上海。此后阁书又随着局势转辗重庆、南京等地,后于新中国成立前夕运往台湾,现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二分文溯阁《四库全书》贮藏于盛京故宫。曾于袁世凯掌权时被运往北京,后又运回沈阳。1966年,文化部决定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甘肃。文溯阁《四库全书》现完好地保存于兰州。兰州为了更好地保存《四库全书》,为其专门建造了设施齐全的藏书馆。第三分文源阁《四库全书》贮藏于京郊圆明园。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焚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全部化为灰烬。文津阁《四库全书》贮藏于承德避暑山庄,保存完好,今藏北京图书馆。

江南三阁更是惨遭焚毁散失的厄运。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春,续缮三分《四库全书》正式颁发江浙二省。仅到咸丰三年(1853年),文宗、文汇两阁

①《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候选从九品陈逵奏折。

②《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谕。

③《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乾隆五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多罗质郡王永瑆奏折。